

##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左右田直规《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关注“殖民知识”的本土化与“马来亚”对泛马来人身份的追求之间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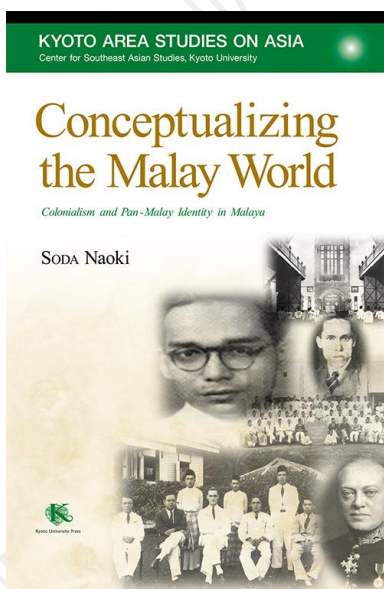
**编者按：**本期区域动态关注“马来人”“马来民族”和“马来西亚”这些被赋予特定内涵、具有特定历史语境和内在逻辑的概念。冷战时期的马来亚，反殖、反帝、抗日、寻求独立等各种意识形态与价值认同呈现权衡与竞争的态势，“马来亚”作为英国殖民者创造的政治符号，是基于其统治的政治疆界而界定的，并非基于民族历史、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自然形成的。因而“马来亚”究竟是“想象的共同体”还是“概念化的世界”？同样，马来人的身份概念经历了各种转变。前殖民时期的身份认同基于对苏丹国的个人忠诚和亲属关系。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建立的领土管辖权和初具规模的“马来亚”扩大了马来人的认同基础。与此同时，“泛马来人”概念的竞争性表述首次出现在非马来人穆斯林和马来人穆斯林知识分子之间，去殖民化和民族国家的独立催生了对马来人身份的排他性表述。随着马来社会的现代化和马来中产阶级的出现，“马来人”的概念界定不断更新。

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左右田直规（Soda Naoki）所著的《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Conceptualizing the Malay World: Colonialism and Pan-Malay Identity in Malaya*）揭示了殖民知识本土化结果同其制造初衷间的巨大张力：殖民者在马来亚建构了新的马来人概念，但殖民知识的本土化过程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它唤醒了以易卜拉欣·雅各布<sup>①</sup>为代表的马来民族主义青年，解释、转变和化用着殖民知识，试图重新概念化

<sup>①</sup> 易卜拉欣·雅各布是建设马来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就读于苏丹依德里斯师范学院，在 1930 年创办马来亚青年会（Belia Malaya），1938 年同其他马来知识青年创立马来亚青年联合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M）。学界通常将易卜拉欣视为马来亚正式抵抗英殖民统治的第一位政治领袖（范若兰 2018: 152）。在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八打灵再也：文运，2021，第 9 页）中译作“依布拉欣·耶谷”。在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科书《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史》（加影：董总，2017，第 232 页）译作“伊布拉欣·耶谷”。范若兰等《马来西亚史纲》（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第 152 页）译作“易卜拉欣·雅各布”。此处根据范若兰等中国大陆学界中文惯常译法译出。马来亚青年联合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M）成立于 1938 年，是一个坚持“大马来亚”（Melayu Raya）信念的马来民族主义激进左倾团体。“大马来亚”（Melayu Raya）的构思是由苏丹·依德里斯训练学院历史讲师阿卜杜勒·哈迪·哈桑（Abdul Hadi Haji Hassan）所提出，呼吁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南部（Patani）、新加坡和菲律宾南部（Sulu）的马来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马来世界（Alam Melayu）必须团结在一个“大马来亚”的概念下，形成一个超越地区狭隘精神和民族主义的马来民族，以发展社会经济。曾任北婆罗洲渣打公司（Syarikat Berpiagam Borneo Utara 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董事的布拉西勋爵（Lord Brassey）也曾提到“大马来亚”的想法，为确保英国在东南亚的管理能更有效地进行。——译者、编者注。

马来性，提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主和建立“大马来亚”（Melayu Raya）的诉求。

“殖民知识”（colonial knowledge）作为一个概念，由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其长达 30 年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的实证研究中提出，普遍应用于马来西亚历史和东南亚历史的论述中。本书不否认殖民者在创造和再生产民族身份方面的影响，但更强调被殖民者在其中并非是消极参与者。殖民知识提供了思想工具，本土知识分子利用殖民主义知识建构，以本土化的理念而不单是英国殖民力量，来创建、改造他们自己国家，并重新定义“马来人”的种族概念，调解了“官方人口普查分类和大众意识之间的差距”。本书系统梳理了马来亚左翼独立运动先驱的思想脉络，超越后殖民主义之后的想象，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互动和马来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有助于读者思考新兴民族国家运作的本质逻辑。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办刊物《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于 2022 年 4 月发布文莱达鲁萨兰大学历史和国际研究高级助理教授隆美尔·A. 库拉明（Rommel A. Curaming）关于左右田直规教授所著《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在过去几十年中，马来西亚对种族政治（racial politics）的反复质疑为一些著名的书籍和文章的出版铺平了道路，这些书籍和文章探讨了马来人的边界和马来人的概念化。左右田直规的《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一书是对这一领域有限但不断扩展的研究的一个可喜补充。

这本书的前提简单明了：像 R.J.威尔金森(R.J.Wilkinson)和 R.O.温斯泰德(R.O.Winstedt)这样的英国学者兼殖民地官员所生产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已实现本土化或在地化(indigenised or localised)，而不是被动地被马来人接受，其产生的结果是矛盾的。这一过程中再现了殖民主义，同时也塑造了支撑马来民族主义的泛马来人身份(pan-Malay identity)。左右田直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研究“殖民知识传播和化用”(transmiss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colonial knowledge)的再生产和转化效应，来解释他所认为的“殖民教育和马来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第 54 页)。

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卓越贡献。这本书对 20 世纪早期阶段马来亚与马来人身份形成相关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调查。它试图涵盖知识生产、传播和化用的多个层面，这样的研究在东南亚语境下尚未完善，值得人们注意。第二章和第三章清晰地描绘了英国人在马来亚实施的本土教育体系的内容和框架，聚焦于一所师范学院——苏丹·依德理斯师范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 SITC)。SITC 课程、课外活动和宿舍生活的描述很有学术价值，它展现了可能激发民族主义情感的教育实践和普遍氛围。

第四章详细分析了两位英国学者兼殖民地官员(威尔金森和温斯泰德)和一位马来教师(Abdul Hadi 阿卜杜勒·哈迪)编写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内容。本章还强调了在三个主要主题的概念化中，从英国视角到本土视角的转变与连续性：马来人共同体(Malay community)的广义定义不以宗教为基础，而广泛包含马来半岛以外的“混血种族”(mixed race)；马来人“家园”(Malay “homeland”)是一个在州、半岛和群岛范围内，灵活而广泛的概念；最后，其历史时间观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ist)和进化论(evolutionary)的。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本章具有启发性。

上述三个主题的选择似乎具有战略意义。第五章中讨论了易卜拉欣·雅各布(Ibrahim Haji Yaacob)的生活和思想，通过其案例阐述了其如何将殖民知识转化和适用为民族主义思想。本书综合了大量现存的和新的资料，包括那些用日语撰写的资料以及迄今为止很多人都无法接触到的资料，以及为支撑本书主要论点而组织的关于易卜拉欣生活和思想的素材，使这本书成为已出版研究易卜拉欣·雅各布的几部作品中值得一读的作品。

然而，作为对马来人身份和民族主义的分析，本书主要论点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可能会受到质疑。民族主义难道不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应吗？难道不是像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1986)提出欧洲

中心主义话语的形式和衍生形式是模块化的吗？民族主义难道不是一种智识活动吗？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自我形成（self-formation）的行为，难道不应该站在民族主义者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外部观察者的立场上去看待、感受和构想吗？

研究中使用殖民教科书作为主要来源，有效地确立了英国殖民主义在泛马来主义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并将马来民族主义狭隘地视为主要是反殖民主义。显然，左右田直规注意到这种分析路径的限制，但他仍然选择通过“英国殖民主义……对马来亚当地居民行使了强大的知识霸权”来为其辩护（第 3 页）。他主要集中在易卜拉欣·雅各布关于共同体、空间和时间的观点上，以说明这一分析方案，而遗漏或低估了马来民族主义可能更广泛和更深层的来源（包括伊斯兰教和反非土著人情绪<sup>①</sup>），以及马来民族主义的多样性，这些民族主义来自竞争的民族意图（nations-of-intent），富含不同的色彩——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亲殖民主义（pro-colonial）和伊斯兰主义（Islamic）等等。易卜拉欣被认为是非精英、大众和反殖民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造成了一种误导性印象，即殖民知识被化用于民族主义目的是一件大事。亲英国民族主义者（Pro-British nationalists）也可以被证明做了本质上类似的事情，但由于该书对民族主义的狭隘概念，他们在分析中被忽视了。如果能比较马来亚的反殖民主义和亲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者是如何将殖民知识适用于各自目的、如何以此确立殖民知识的重要程度，将会很有启发性。更重要的是，将民族主义者的类别扩大到包括反殖民主义者和亲殖民主义者，以及非殖民主义者（non-colonial，因选择或默认脱离殖民关系的直接范围的群体），凸显了明显的伪二分法和稻草人谬论（straw man's fallacy），这也是所谓殖民教育和马来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基础。在某些情况下，与其说他们是相互排斥或对立的，倒不如说它们可能是相互强化或共构（co-constitutive）的。

该分析框架也可能被其知识分子智识偏见所拖累，将民族主义主要视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或一种智识行为或产出。如果民族主义被更全面地概念化，包括其情感性、表演性、过程性和平庸或经验性的属性，本书可调整其主张，通过减少教科书知识的权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民族主义。

因此，我想更多说明，泛马来人的身份认同可能也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它并非主要是智识活动的最终结果。在对易卜拉欣早年生活的讨论中窥见一斑，

<sup>①</sup> 译者注：anti-non-Bumiputera

但由于这本书的分析方案偏好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t），这一点不幸地被当作背景资料遗漏了。

这些疑惑并没有使这本书失去价值。它研究充分，经验丰富、架构良好且写作清晰。这对我们理解马来西亚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历史有着重要贡献。

（英文原文见 Rommel A. Curaming. (2022). Malaysia. Conceptualizing the Malay world: Colonialism and Pan-Malay identity in Malaya By Soda Naoki 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xix 206.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3(1-2), 385-387. doi:10.1017/S002246342200011X. 编译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主办刊物《马来西亚研究》（*Kajian Malaysia*）于 2021 年 4 月发布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诺丽森·卡迪尔（Norizan Kadir）关于左右田直规所著《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诸多学者从多方面对英国殖民时期马来民族主义的历史开展了严谨的研究；然而，它从未讨论到尽头。这个话题一直吸引着那些有兴趣通过使用不同方法来重建历史经验的学者。这些发现似乎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复杂且矛盾的。如果没有教育的重要作用，马来民族主义就永远不会实现。英国政府将本土教育作为控制马来人思想的有效武器，从而维持其在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傅乃华（J.S. Furnivall, 1948, 393）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用适当而聪明的教育方法塑造一个有文化的人群，比用机枪镇压一个文盲暴徒更为愉快，也更具性价比。”然而，人们永远无法预料教育对殖民地人民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内心与殖民地宗主的思想 and 心灵从未相同。

马来激进分子反对的民族主义概念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象。许多马来学生接受了相同的教育，特别是来自苏丹·依德里斯教师培训学院（SITC）的人。他们通过基于泛马来主义（Pan-Malayism）的广泛概念重建自己想象的共同体，表现出对殖民地宗主的抵抗，这一点在“大马来亚”（Melayu Raya）或“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sup>①</sup>的愿景中得到体现。

<sup>①</sup> 译者注：也可作“泛马来亚”“泛印度尼西亚”。SITC 的马来青年在当时受到印尼政治思潮如“大印度尼西亚”的影响，进而产生了“大马来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主张马来亚与印尼联合反殖和统一，构建一个“大马来亚”国家。范若兰等《马来西亚史纲》将“Melayu Raya”译作“大马来国”，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将这两个概念译作“大马来人”和“大印尼”，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科书《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史》中译作“大巫来由国”和“大印度尼西亚国”。

这种愿景成为许多接受 SITC 教育的马来激进分子的雄心壮志，其中也包括易卜拉欣·雅各布（Ibrahim Haji Yaacob）。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努力改进马来教育体系，向马来人灌输殖民者别有用心的殖民知识。然而，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控制知识的结果，这些知识带来了事与愿违的矛盾后果，以及马来人不可避免的反。此外，许多西方教师的种族主义和专横态度进一步激发了当地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态度往往会激起学生的强烈抵制（Zinoman 2014, 52）。

能够评论一本关于自己母校的书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本书《马来世界的概念化：马来亚的殖民主义和泛马来身份认同》，最初是一篇博士论文。该书于 2020 年首次出版，它让我们大开眼界地认识到马来教育机构，尤其是 SITC，在整个马来亚激发马来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的作用。尽管讨论仅限于某些方面和标准，但在分析殖民教育对英属马来亚泛马来人身份形成的影响时，该书无疑提供了引人入胜的分析。该书的分析相当深入和细致，其组织观点的行文架构亦清晰有序。书中为收集一手数据和二手资料（如访谈）而进行的艰苦研究应大为赞扬。

这本书由七章组成。每一章都展现了这样的分析流程：殖民知识如何被马来人传播并将其适用于建构泛马来主义（特别是“大马来亚”），以及培育“马来性”（Malayness）身份认同。作者针对本研究的局限性在导言中进行了非常清晰的解释。正如导言中所表达的，这本书并不是对马来亚身份政治历史的全面研究。作者在导言中清楚地表明，他研究的意义不同于以往关于马来亚殖民地马来政治的成果。有趣的是，作者聪明地将社会历史方法的优势融入到文本话语分析中，同时也考虑到政治辩论的影响，以检视马来世界中知识的传播和化用。第二章介绍了英属马来亚马来语教育的概况和背景。第三章对 SITC 的教育实践进行了广泛调研，包括学院的历史背景、SITC 的正式课程、课外活动、学院的宿舍生活，以及 SITC 师范教育中族群、阶级和性别关系的再现。

作为本书的核心，第四章特别在 SITC 的背景下，根据 R.J.威尔金森（R.J.Wilkinson）、R.O.温斯泰德（R.O.Winstedt）和阿卜杜勒·哈迪·哈吉·哈桑（Abdul Hadi Haji Hassan）编写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对殖民知识的传播进行了全面分析。作为 SITC 历史课程的主要参考，从经典文本到授权历史教科书的转变，成为了对历史新解释的提供者，历史是以理性方式复兴马来身份的媒介。书中讨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解释和普及人口普查中的干瘪数据的重要性，威尔金森、温斯泰德和阿卜杜勒·哈迪在教科书中，通过的“种族”（race）概

念成功地分享和普及了这些数据。马来人是一个混血种族，而不是一个“纯种”（pure）的种族，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治疗马来人历史失忆的方法。

第五章通过易卜拉欣·雅各布及其盟友倡导的“大马来亚”（Melayu Raya）和“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理念，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了殖民知识型泛马来主义（Pan-Malayism）或泛马来民族主义（Pan-Malay nationalism）的影响。为了全面考察身份认同的形成，作者还以易卜拉欣·雅各布为案例，以其教育经历为基础，追踪其世界观的发展和转变。第五章根据易卜拉欣·雅各布的写作及他在 SITC 的经历对这一点进行了深入讨论。

民族主义的思想概念也受到不同的解释，不再局限于某些党派、精英官僚或政府。通过殖民教育，马来人能够通过化用和混合符合其愿景和意识形态的观点，重构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由于殖民地教育，个人主义和人格的元素在马来人中蓬勃发展。此后，每个马来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不受封建价值观的束缚，通过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和调整民族主义的概念。用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 Milner, 2002, 77）的话来说，“一种更加健全的人格意识”（a more developed sense of personhood）已经到来，为塑造社会和政治意识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第六章论述了 1961 年 5 月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宣布“马来西亚构想”（Malaysia proposal）后，马来身份认同步入了新阶段。通过“马来西亚构想”确立的“马来性”（Malayness）从未受到挑战。不过，许多关于马来人身份的问题出现了，其中包括关于谁是马来人的争论。第七章是对整个讨论的简明总结，观察“马来性”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发展历程。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它包括马来身份认同形塑的一些发展，但它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分析，例如“2020 宏愿”（Wawasan 2020）的失败及其对身份认同塑造的作用，以及马来身份认同对“马来西亚民族/国族”（*bangsa Malaysia*）建设的影响。如果作者超越权威机构或政府相关组织的角色，比如关注非政府组织（NGO）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推动“马来性”身份认同的贡献和努力，那会更有意思。

这本书可以考虑作出如下改进。如果能提供更多关于 20 世纪早期马来人教育的统计数据，将会是一个更好的论点。这对于全面了解英国殖民时期马来人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要。尽管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作用和影响不应被低估，因为它是“马来性”身份形成的一个因素，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东南亚人仍然没有受到殖民时代教育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属马来亚有四分之三的马来人没有接受过正规小学教育（Zinoman 2014, 50）。

需要进一步分析殖民知识与马来人现有的各种书面资料和口头传统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跨领域的关系为如易卜拉欣·雅各布般马来激进分子构建、解构和重建马来身份认同 (Malay identity) 和马来主义 (Malayism) 以适应其政治野心铺平了道路。此外, 由于这项研究与马来人的著作有关, 例如易卜拉欣·雅各布的著作, 因此原文的引文和摘录应以其源语言引用, 以保留原文的意思, 而不是放在尾注中。译文应放在原文之后或尾注中。对于马来语读者来说, 很难享受书中讨论的源语言作者所提出的原创思想。

尽管有这些技术性的批评, 但总的来说, 这本书的出版丰富了马来民族主义的历史。这本书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对四本教科书以及易卜拉欣·雅各布的诸多著作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文本分析。教科书中的每一个重要的关键概念都经过了严格的分析, 从而使本书成为每一位热心研究者和读者, 尤其是那些研究马来民族主义的专家的必读之作。

#### 参考文献:

Furnivall, J.S.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ner, A. 2002.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inoman, P. 2014. Colonizing minds and bodies: Schooling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ed. N.G. Owen, 46–53. London: Routledge.

(英文原文见 Norizan Kadir. (2021). Conceptualizing the Malay World: Colonialism and Pan-Malay identity in Malaya (Book review). *Kajian Malaysia* 39(1): 197–201. <https://doi.org/10.21315/km2021.39.1.10> 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 王晓峰

编译: 李庚润

统筹审校: 东南亚组